



从《醒世姻缘传》看明代晚期服饰



江兰英 (南昌大学中文系)

引言

《醒世姻缘传》^①是继《金瓶梅词话》^②之后,出现的另一部世情小说。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总结以往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康熙中后期说、顺治十八年(1661年)说及明末崇祯说。胡适、孙楷第一致认为此书的作者是蒲松龄,即形成了以此二人为代表的康熙中后期说,但随着版本问题研究的深入,此说渐被反对。出现了以金性尧、王守义为代表的明末崇祯朝说,此二人都否认此书为蒲松龄的著作,并提出此书为明人写明事,约成书于崇祯末年的推断。顺治十八年(1661年)说则以徐朔方、徐复岭等为代表的。杨春宇对照以上诸说,认为此书最初创作于明末清初,作者西周生当为由明经南明后入清的人,成书下限不晚于清顺治十八年,上限不早于甲申事变(1644年)。笔者看来杨春宇说法比较可信。尽管这部小说创作的确切年代尚无可考,不过此书写于明末、刊于清初,大致可以确定;书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方言,描写了明末或明末更早的生活状况,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尽管中国古来就是衣冠大国,服饰发展历史绵长,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却是很晚的事,明代服饰的专门性研究更是近二十年来才发展起来。如孙机对明代的束发冠、髻髻及其头面,对照出土文献进行了梳理。扬之水则以专题的形式对明代的头面展开了细致的论述。这些学者的研究都秉着文献与实物互相对照、互相印证的方法,为明代服饰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当然以前通论性的著述也有明代服饰方面的研究,如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从历史实证与宏观发展演变角度来研究古代服饰,注重文献资料从而推究服饰的渊远流变。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以中华服饰的起源作为开篇,内容包括服装制度、形式、面料、纹样、首饰配饰等,分类详细,图文并茂,但只能作为服饰知识的常识性了解。高春

明《中国服饰名物考》涵盖服饰、容冶、妆饰、首饰等众多层面,对我们了解明代服饰不无帮助。研究与实物是无法分开的,上世纪下半叶以来,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比较重要的有明定陵、江西南城诸王墓、南京的王侯墓、湖北明梁庄王墓等^③,近年来出版的《明朝冠服首饰》^④,则是一部展示明朝上层社会礼俗妆饰文物的专题性图录,也是一部展示明朝服饰的经典性图录。这些发现和研究对于研究明朝服饰具有特殊价值。《醒世姻缘传》对明代晚期社会风俗人情有着客观细腻的描写,对服饰也有更为详细的叙述。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就《醒世姻缘传》,并结合同时期《金瓶梅词话》等,就书中的服饰资料,在当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来展示明代晚期民间服饰的一角。

一、书中出现的首饰

明代金银首饰的使用相比以往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首饰的插戴方式,与此前相比,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这种变化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应是髻髻的出现。髻髻是明代最为流行的一种假发,是用银丝、绉纱或绉布等编结而成,四时都可以佩戴的,其上饰以珠、钿、簪、梳、钗等。《明史·舆服志》:“洪武三年定制,凡宫中供奉女乐,奉銮等官妻,本色髻髻”。这里的“本色”指所裹织物的颜色,此时髻髻变成罩在发髻之外的包裹物。髻髻起初就是发髻本身,指挽成某种式样的发髻。直接用头发编成戴在发髻上也是明代最为简便的髻髻。如《金瓶梅词话》第二回说:“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髻髻。”除了“头发髻髻”,髻髻还有很多其他的式样。如银丝髻髻,明朝中后期兴起的风尚,“头发髻髻”此时已不再时兴。银丝编的髻髻在明后期最为常见,在《金瓶梅词话》中出现有六次之多。银丝髻髻一般用细丝编作灯笼孔的一个尖圆顶网罩,至今为止出土的银丝髻髻实物也有很多,如上海浦东万历年间陆氏墓出土的银



图一 浦东明陆氏墓出土银丝髻髻

丝髻髻，外轮廓像小尖帽，中腰以粗银丝分隔成两部分，粗银丝上的拱腰内是空的^⑬（如图一）。

在《醒世姻缘传》中出现的髻髻有金线梁冠、金线七梁、金线五梁冠子、五梁珠髻、尖头髻髻等各式髻髻。而在《金瓶梅词话》中也有诸如银丝髻髻、金丝髻髻、扭心髻髻、金丝绉纱冠儿等。有的金制的髻髻通常会做成冠的模样，上提到的“金梁冠儿”、“金线七梁冠”、“金线五梁冠”，便是这一类。如第五十四回形容童七媳妇的一身打扮，道是：“戴着金线七梁髻髻，勒着镜面乌绉包头”；又第七十二回中：“云鬟紧束红绒，脑背后悬五梁珠髻；雪面不施白粉，耳朵垂贯八宝金环”。《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六回中：“月娘亦盛装缟素打扮，头上五梁冠儿，戴着稀稀几件金翠首饰”，在这里，“金线七梁髻髻”、“五梁珠髻”、“五梁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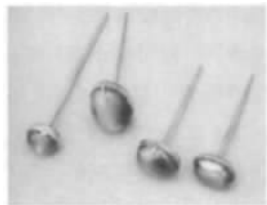


图二 明刊《西厢记》插图

儿”，指的都是细金丝编缀，起梁冠的髻髻。这类髻髻都比较贵重，在江西南城县明益庄王朱厚焯墓继妃万氏棺内出土过一件^⑭。明代女冠在形制方面与男冠有相似之处，但在高度上比束发冠要高，束发冠是用来约发的，高度一般在4厘米左右，而髻髻冠的实物一般高度都在8厘米左右（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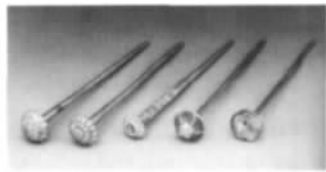
佩戴髻髻是有身份限制的，是明代已婚妇女的正装，不论是家居、外出或会见亲友时都可以戴。本书第四十四回说：“狄婆子把他脸上十字缴了两线，上了髻髻，戴了排环首饰。”在这里素姐结婚了才给她戴上了髻髻。上了年纪的老妇人有专门的“老婆髻髻”，第四十九回小魏领着吴婆子来见晁夫人，当时吴婆子就戴着一顶“老婆髻髻”。另外，守丧带孝，则戴“白绉纱髻髻”，简称“孝髻”或“白髻”。第四十二回，讲到魏氏再嫁“把那麻绳、孝衣、纸箍、白髻摘脱将下来，丢在坟上，戴了焮黑的金线梁冠”。

髻髻一般不单独戴，总是要围绕着它插上各种簪钗，实际是以簪为主。钗原本有固发的作用，此时也多由髻髻代替，那么与簪相比，钗的退居其次也就很自然了。明代的簪子根据式样、质地不同，名称也不尽相同。《醒世姻缘传》中如紫金簪、乌银古折簪、金玉古折大簪、玉簪等等，“紫”是金簪的颜色，书中簪子的质地就有玉的、金银（乌银）的等。定陵出土的首饰（仅指头上的饰物）有248件，其中簪有199件^⑮。其中有几对镶嵌猫眼石的金簪相当精巧，这几颗猫眼石体积大，色泽光亮细润（图三）。如孝端后的一件呈半圆弧锥形，整器共镶宝石80块、珍珠108颗，金托上镶宝石又嵌花卉状玉托，玉托上下镶嵌珠宝。又如江苏南京明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墓发现了雕花碧玉簪、雕花白玉簪、嵌玛瑙金簪、嵌蓝宝石金簪、嵌水晶金簪、珊瑚簪、琥珀簪各类簪子^⑯。



图三 定陵出土猫眼石

有一种常见的小簪子是花头簪。圆锥形的簪脚，簪顶是一朵小花，以梅、菊、莲花等居多。讲究一点的，花上嵌珠、嵌宝。明徐达五世孙徐備之继室王氏墓中也有一对这样的簪子（金镶宝梅花簪），头部呈梅花瓣状，一件中嵌猫儿眼，另一件中嵌绿松石^⑰。明华复诚夫妇墓曹氏戴的两对鎏金银簪，簪顶上也是两朵莲花，并且一朵莲花的花心里还嵌有宝珠^⑱。《天水冰山录》“金簪”条目中就列有金玉顶梅花簪、金镶玉梅花簪、金镶玉莲花插簪、金宝顶桃花簪、金珠宝梅花簪等等都是不同样式的花头簪。长泾明墓出土金花簪，有菊花头，还有嵌宝石梅花头^⑲（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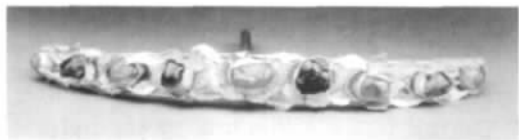


图四 江阴长泾明墓金花簪

明代还有一种耳挖簪，魏晋南北朝时已经流行，南昌东吴高荣墓中出土一件金耳挖长度就达到24.5厘米^⑳。明代的耳挖簪多半都很短，总在10厘米左右，有的更短。南京郊区出土的四件金耳挖，长4.8至10厘米不等^㉑。耳挖簪的插戴，或单或双，都很常见。在本书中出现的金耳挖都是大多以单只出现的。如第四十一回中：“你这个扯谎的小厮！前日那枝金耳挖子，念说和前日那一枝是一对儿。”

明代年轻的妇女有戴头箍的风尚。本书中有珍

珠头箍、珠箍、青遍地锦箍儿等,第九回计氏给其父的包里就放有“两顶珍珠头箍”。头箍是一条绸帛、丝或缎等材质制作而成的带状装饰物,从额与发之间向后兜,收拢系结于脑后,当时被称作“箍儿”。初期只用来束发,后变成了一种装饰,掩于髻髻之下。因箍儿多缀珠,所以又称“珠子箍儿”^②。孙机认为头箍就是“钿儿”,其只是头箍的一个别名^③。头箍与钿儿虽都插戴于髻髻之下,但并不属同一物。如《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八回中:“吴银儿来到,头上戴着白绉纱髻髻,珠子箍儿,翠云钿儿,周围撒一溜小簪儿”,如两者是同一物件,此处就不会同时出现了。头箍都是用带子来系结的而钿儿两边是钩子,珠子箍儿是当时女子的一种平常装束,并且佩戴时没有年龄限制。如本书第九回:“那郑伯龙把自家见有的银子、银酒器、首饰、婆子和儿妇的珠箍,刷括了净”,由此可见,年幼皆喜戴之,且其上多以装云朵形饰片者居多,但它的花样并不限于这一种。江苏无锡明华复诚妻曹氏墓中发现的头箍就是在髻髻的正面底部,它是一条弧形的银带,上面用线串起了11枚鎏金饰片,两头的带子则是插入髻髻两边银簪上面的帽子里。长泾明墓前嵌宝石金头箍呈弧状,焊接菊花、牡丹花、镶嵌红蓝宝石作花蕊^④(图五)。《天水冰山录》里“头箍、围髻”一项也有“金镶珠宝头箍、金镶珠玉



图五 江苏江阴青阳邹氏墓出土

宝石头箍、金镶珠玉头箍”,箍儿在盛装时只作为陪衬,在家常佩戴时却非常醒目。头箍的实例也有很多,如明代兵部尚书赵炳然夫妇墓的九件小金饰,珠子沿边上就有做工精细的八仙和寿星^⑤。江西南城明益宣王妃孙氏墓出土的头箍上也嵌有寿星和八仙,两端还有供来系扎的带子^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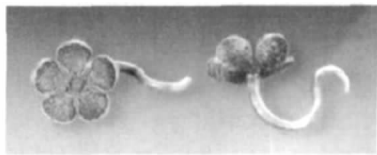
明代的钿儿,也叫花钿,是用金银打成各种花样插在头发上的装饰物,它的两端一般有很细的弯钩,用来固定在头发上的,其纹饰呈半立体状,图案极其多样,有人物、神像、鸟兽、楼阁及花边等,有山峰形的、叶片形以及“山”字形,且正背面均有纹饰。无锡明华复诚夫妇墓发现的钿儿,是个如意头,出土的时候戴在髻髻下面。与头箍不同的是,钿儿戴在髻髻的前后都可以。在《醒世姻缘传》第七十八回介绍两位太太出场时“徐太太当中戴一尊赤金拔丝观音,右边

偏戴一朵指顶大西洋珠翠叶嵌的宝花。吴太太当中戴一枝赤金拔丝丹凤口衔四颗明珠宝结,右戴一枝映红宝石的绛桃。”此“赤金拔丝观音”是发髻正中央的大簪,名曰挑心,是明代头面的要件。上海浦东陆深墓中其夫人即戴一个观音挑心,金莲座、金飘带中镶嵌玉雕观音^⑦(图六)。《醒世姻缘传》与之不同是金丝制作的观音,但是形状大体相似。



图六

作为头面之一的耳饰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耳环,另一类是耳坠。典型的明式耳环簪戴起来弯脚露出很长,耳坠则是一个开口的圆环,下缀可以摇荡的饰件且簪戴时不露脚。何为耳环与何为耳坠至今还不太明确,“似乎可以说,耳环比耳坠更为正式”^⑧,其以《明史·舆服三》报列品官命妇冠服,耳饰均为环,故宫旧藏明代皇后画像,与凤冠霞帔相配的多为耳环等来作为例证。在《天水冰山录》中关于“耳环、耳坠”条目中总共列出了267副之多,耳环所占比例明显比耳坠大。有一珠、二珠、四珠、八珠较简单,也有用各种花纹并嵌珠嵌宝等复杂点,有楼阁形、玉兔形、甜瓜形等等。明代最为多见的是葫芦形耳环,因其是由两珠串连而成,形似葫芦而得名。《金瓶梅词话》中多次提到的“二珠环子”,实际上就是“天生葫芦”^⑨,还有“四珠环儿”、“八珠环儿”等。《天水冰山录》“耳环耳坠”一项中就列有“金镶四珠耳环”、“金镶四珠宝耳环”。明墓中发现的葫芦形耳环也是最多的,如江苏南京明徐达五世孙徐辅夫妇墓^⑩、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⑪、明兵部尚书赵炳然夫妇合葬墓^⑫等都有实物。《醒世姻缘传》中耳饰名目有双金排环、金珠珠排、环子、金丁香、八宝金环、坠子。另外,在《醒世姻缘传》第七十一回中有提到“四分重一付一点油的小金丁香”。“小金丁香”是明代耳环中最为简素的,也是最为流行的一种,它的式样极小,在环下边有一个小小圆头,其式恰似一点,因此得名。南京中华门外邓府山王克英夫人墓出土一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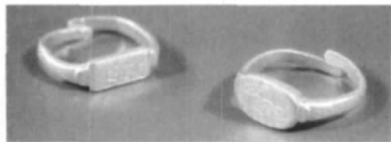
图七 丰台区明代李文贵墓出土金丁香

耳环头打成蘑菇头状^⑧。北京市丰台区明代李文贵墓(图七)出土一件金丁香面为五瓣花,花后有钩。花瓣填金丝^⑨。都是金丁香实例。

二. 书中出现的臂饰

在本书中提到的手镯有“银镯、乌银镯子、手钏、手镯”之类,如第三十六回晁夫人就给春莺打了“一副四两重的银镯”,又第七十五回寄姐“伸出白藕般的手臂,带着乌银镯子”,手镯提到了三次之多。明代手镯,镯面多为中间宽,两头狭,宽面压有花纹,两头收细如丝,朝外缠绕数道,留出开口可以戴时根据手腕粗细进行调节。主要是金、银,有的镶宝石。江苏南京中华门外明黔国公沐睿墓出土了两个圆形金镯和一件水晶环:“金镯的接口饰为二龙首,镯上还嵌红、蓝宝石。另外,水晶环的两头接口处雕的却是一只首尾顾盼的鹦鹉。”^⑩

本书中出现了如金戒指、银戒指、古折戒指、乌银戒指等款式。戒指也叫“指环”或“约指”,在《金瓶梅词话》第十五回吴月娘等人于李瓶儿家楼上观灯,潘金莲的打扮:“那潘金莲一径把绫袄袖子儿搂着,显他那遍地金袖儿,露出那春葱来,带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南京江宁谷里明墓发现金戒指,环状戒指,中央压扁形成薄片状戒面,整个戒指恰似马镫,这是明代的样式^⑪(图八)。此书中以乌银质地的



图八 南京江宁谷里明墓出土金马镫戒指

戒指最多,不过此外还多次出现以乌银的饰品。如乌银挑牙等。宋氏《家规部》卷四云:“乌银亦银也,乃用硫磺等药镏成乌色”^⑫。不过,本书中说到的乌银恐怕有时并不是纯银,而是掺了许多铜,有的甚至可能全部都是铜。例如,第七十回中:“打造金银首饰之物,就是三七搀铜,四六搀铜,却也都好看。惟这乌银生活,先把来烧得发黑,再那里还辨得甚么成色;所以一味精铜”。

三. 书中出现的巾帽

《醒世姻缘传》中出现的巾饰样式繁多,如方巾、浩然巾、网巾、唐巾万字巾、老人巾、幅巾等。巾亦称“头巾”,《释名·释首服》载:“巾,谨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巾一般以葛、布或丝织物制作,裹覆于头部。明代的头巾使用范畴极其广泛,观察明代

肖像画中的男子,凡不穿官服的,几乎一律头巾,头巾是当时士人在燕居之时的必备装扮。

在本书,方巾的使用最为频繁,达十二次之多,它虽不是一般下层民众的装束,但士人都热衷于佩戴。方巾也称“四角方巾”,是明代男子所戴的一种巾。其款式高而四角方正,以黑色纱罗制成。《三才图会·衣服》:“方巾,此即古所谓角巾也,制同云巾,特少云纹,相传国初服此,取四方平定之意”。《明会要》卷二十四引《集礼》:“洪武三年,士庶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所以本书出现的方巾的质地,只有紫绒、黑绒、黑绉纱、以及马尾登云方巾等。

明代男子有一种专门用来束发的网罩,当时称作“网巾”,又叫做网子,产生在洪武初年。《三才图会·衣服》:“古无是制。国朝初定,天下改易胡风,乃以丝结网,以束其发,名曰网巾,识者有法束中原四方平定之语。”网巾通常是以黑色的丝织、马尾或棕条编织而成。如同鱼网,网口用布帛作边。旁边常常缀有金属制成的小环,称为巾环。环内贯以绳带,收紧即可约发,在网巾的上端也开有圆孔,并缀以绳带,使用时将发髻穿过环儿,用绳带系住。如此书第六十一回:“计开新网巾一顶,新网巾一顶并金圈。”这里提到的“新网巾并金圈”指的就是网巾与上面的金属环。一般家居时可只戴网巾,外出则必须戴上帽子,此外则对于朝服、官服戴纱帽笼巾下面先加网巾,可起约发作用。至于一般老百姓,网巾实可有可无,讲究的用它,马虎点的即不用。在本书中提到网巾达三次之多,如第四回中:“(禹大爷来拜晁大舍)珍哥说‘你还把网巾除了,坎上浩然巾,只推身上还没大好,出不得门’”。明代的网巾在《三才图会》中有图例,形制清楚,明万历帝定陵出土了12顶大体相似的实物。

浩然巾只有男子才会佩戴,在《醒世姻缘传》中出现过两次。如第三回中:“晁大舍勉强穿衣起来,没梳头,将就洗了手面,坎了一顶浩然巾,头上也还觉得晕晕的。”浩然巾是明代的一种风帽形式的头巾,是一种用黑色布缎制成的暖帽,相传唐代名士孟浩然常戴此帽外出,以御风雪,时人见之,争相仿效。明代文人觉其风雅,也常戴之,多用于秋冬之季。它可以单独戴着去见客。如本书第四回中:“你还把那网巾除了,坎了浩然巾,只推身上还没大好,出不得门;不然,你光梳头,净洗面的。”老人巾是明初开始就使用的巾样,《三才图会·衣服》尝见稗官云:“国初始

进巾样,高皇以手按之使后,曰:‘如此却好’遂依样为之,今其制方顶前仰后俯,惟耆老服之,故名老人巾。”将巾、结巾都是用尺帛裹头,又缀片帛于后,其末端下垂,俗称“扎巾”,老人巾的式样是由宋代的敛巾发展而来。第四十四回介绍那宾相:“老人巾插戴绒花,外郎袍拖悬红布,把贼眼上下偷瞧,用狗口高低喝唱”。

“幞头”本书出现过四次,而“金幞头”却出现了有七次之多。如第十六回:“(晁夫人)又梦见一个穿红袍戴金幞头的神道坐在衙内的中厅,旁边许多判官鬼卒,晁源跪在下边,听不见说的是甚话。”又如:“(晁源)又要叫画士把喜神画穿有蟒玉带金幞头。”此处的“金幞头”指的是一顶“朝冠”。如十八回众人笑道:“这是朝冠,怎么会是金幞头。”金幞头是涂了金漆的,虽然宋代开始流行,但是并不是官员的正装。明代幞头与纱帽不是同一物,本书第八十三回:“相主事别了回去,狄希陈忙着做圆领,定朝冠、幞头、纱帽、打银带、做皮靴、买玳瑁、幞锦绶、做执事伞扇。”这例中曾提到狄希陈赴任前置办之物既有“幞头”又有“纱帽”。显而易见,“幞头”与“纱帽”并非一物。明代的幞头不是纱帽。较高级官员虽然戴幞头,但戴幞头之人并非皆为较高级官员。仅就本书所涉,戴幞头之人有多种,而并非所有都是较高级官员,具体而言,有做官、有教书先生、有神道、还可以是妖精等。由此观之,黄肃秋先生将“幞头”注为“纱帽”,并将佩戴人员的范围仅仅局限于“较高级官员”是不甚妥当的。《明史·舆服志》卷一:百官公服之幞头,“漆纱为之,展其角(脚)”。《明史·舆服志》卷三也说:“洪武二年,礼官议定:‘侍仪舍人导礼,依元制,展脚幞头,窄袖紫衫,涂金束带,皂纹靴’”。在《金瓶梅词话》有出现过“展脚幞头”,如第四十六回:“但坐坛遣将儿,怪不的,你做了大官儿,恐怕打动你展脚儿小,就只遣他去!”又六十三回:



图九 展脚幞头

“书童那奴才,和他拿去是的,怕打了纱帽展脚儿!”这里说的,均是展脚幞头,实例见明刊《红拂记》插图(图九)。

“瓢帽”在本书中出现达四次以上。如第二十一回:“晁夫人一面出去见他两个,一面

叫人收拾素斋。只见两个都穿栗色绸夹道袍,玄纁瓢帽,僧鞋净袜”,又“徐老娘把小和尚抱到跟前,月白脑塔上边顶着个瓢帽子”;第三十回中:“也与小和尚做的一领栗子色偏衫,纁纱瓢帽,红段子僧鞋,黄绢小褂子。”明代瓢帽是一种僧帽,制如古弁,像瓢形,因形状像瓢得名。明刊《古城记》插图(图一〇)。本书还出现毗卢僧帽、毗卢九莲僧帽等,皆是僧人帽子。明黄一正《事物纪原》:“毗卢帽、宝公帽、僧迦帽、山子帽、班咤帽、瓢帽、六和巾、顶包八者皆释冠也。”



图一〇

四. 书中出现的衣类

明朝建立后,恢复了汉族礼仪。洪武年间,对服饰制度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宫服级别十分严格,图案上文官绣禽,武官绣兽。《明史·舆服志》卷三,洪武十四年(1381年),令农之衣紬、纱、绢、布,商贾止衣穿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便不得衣紬、纱。万历以后,禁令松弛,鲜艳华丽之服,遍及黎庶。明代冕服除非常重要场合之外,一般不穿,朝服以袍衫为尚,盘领右衽,袖宽三尺,袍上缀补子,与乌纱帽、皂革靴相配套是典型的明朝官员服式,各阶层便服有袍、裙、短衣、罩甲等。

明代男子袍服有两种结构,一种是直裰袍,一种是程子衣。袍的作用为冬季御寒服,穿于裙外、比甲里(也有不穿比甲的)。颜色以大红为多,也有玄色质料与纹样,因身份高低而有异。本书中出现的男袍有红袍、挂袍以及各类道袍。

本书出现的最多袍服就是道袍,道袍本来也是释道之服,元明之时广泛用于士庶男子休闲家居服装。大襟交领,下长过膝,背间中缝直通到下面斜领



图一一

大袖袍,通常用纱、绫罗、绸缎及苎麻织物制成,多用于士庶男子。明刊《琵琶记》插图着道袍的老者(图一一)。这种款式的衣服衣身宽松,衣袖宽大。根据季节有单、夹、绒、棉之分。如本书第二十六回:“有时穿一领高丽纸面红杭绸里子的道袍,那道袍的身倒只打到膝盖上,那两只大袖倒拖在脚面。”所用颜色以白色、灰色、褐色为主。本书中提到的道袍,质料有纱、绒、罗、绸、也有绢等,颜色上也很多样,有白色、紫花、油绿、翠绿、鹅黄、栗色、银红等。当时的民谣就有:“二可怪,两只衣袖像布袋”。此类宽松的服装,表现文人儒雅或士人燕居野趣风度是很合适的,则作为平民则不能适应劳动的功能需要,民谣把它看作可怪,就不足为奇了。如本书第五回:“胡旦换了一领佛头青秋罗夹道袍,戴了一顶黑绒方巾、一顶紫貂帽套,红鞋绛袜,走到书房。”是明代典型的士人装束。而一般老百姓把道袍当作“华服”,又第二十三回:“冬里一领粗褐子道袍,夏日里一领粗葛布道袍,春秋一领浆洗过的白布道袍,这就是他的三件华服了。”因此道袍也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限制,出门时才有此装扮。

男服除了袍还有圆领,如屯绢的、绫丝的、青绢的等,以大红色居多。如本书第二十六回:“那四个乐工都换了崭新双丝的屯绢圆领,蓝绢衬摆,头上戴了没翼翅的外郎头巾”,圆领亦称团领,实为无领型领式。盘领形似圆领,内覆硬衬,领口钉有纽扣,隋唐以后多用于官吏常服。如本书第二十一回:“徐太尹上完了梁,穿着大红圆领,坐着轿,回到县里来。”第三十六回中武城县官要做的是“一套大红绫丝圆领”。圆领的领弧线可低可高,一般在领缘上都有缘边,并且在领深周围绣纹饰,但官吏办公事或见客时穿用的公服则不同,领圈边缘纹饰比较简约。本书



图一二 着圆领的官员

第四十四狄希陈做娶亲服也是“青线绢圆领,蓝线绢衬摆”。仍是四十四回中:“薛教授即忙戴了二尺高够伛头纱帽,穿了粉红色的编裂缝的一领屯绢圆领,一条骨镶玳瑁带,

水耳皂靴,出去大门外接了女婿到家。”明刊《红梨花记》插图,乌纱圆领皂靴的官员(图一二)。

明代妇女服式变化非常快,主要有衫、袄、以及裙子等。明代贵族妇女的服色按规定用真红、鸦青黄色,士庶女子只能用紫绿、桃红及浅色。本书中“天蓝大袖衫子”出现了四次之多,但只穿在了计氏一个人身上,如第九回计氏临死前的装扮:“下面穿了新做的银红绵裤,两腰白绣绫裙,着肉穿了一件月白绫机主腰,一件天蓝小袄,一件银红绢袄,一件月白缎衫,外面方穿了那件新做的天蓝段大袖衫。”大袖衫又名团衫,团衫不仅为命妇礼服所用,士庶妇女也可穿着,只是在质料、颜色和纹样上有所区别。在本书中计氏的所穿都只是天蓝色。如《明史·舆服志》卷三:“命妇团衫之制,以红罗为之,绣重雉为等第:一品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六品四等,七品三等,其余不用绣雉”。普通妇女所穿团衫大多用素帛为之,衫上不用绣纹,颜色也比较暗淡。

明代妇女下裳主要着裙,本书中描述妇女四时的穿着几乎没有一处能够离开裙子,其质料花色的名目有:白秋罗连裙、梭布衫裙、白软纱裙、白绣绫裙、月白罗裙、夏布蓝裙、白布裙、纱裙、白罗地洒线连裙等。第五十三回:“郭氏戴着幅巾,穿着白毡套袜,乌青布大棉袄,蓝梭布裙”,其中“蓝梭布裙”的“梭布”,黄肃秋的注为“土布,从前乡村妇女用梭子织出来的布,叫做梭布”。明代此时的裙颜色较浅,以蓝、白色居多,虽有纹饰,但不明显。如第七十三回程大姐就穿了“白春罗洒线连裙”。到了明代末年,裙幅用八幅,腰间细褶数十,行动辄如水纹。此外,还有“百褶裙”,明代多褶裙极为盛行,有一种浅色画裙的叫“月华裙”。裙幅共十幅,腰间每褶各用一色,风动色如月华而得名。其次还有凤尾裙,用绸缎裁剪成大小规则的条子,每条绣以花鸟图案,并镶以金线,连缀成裙。此类裙在书中都未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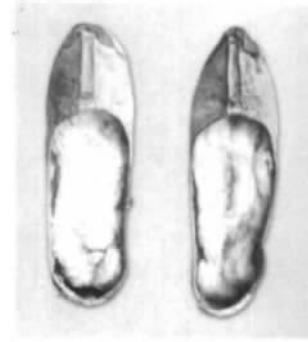
本书“主腰”出现了四处。如第九回:“(计氏)着肉穿了一件月白绫机主腰,一件天蓝小袄,一件银红绢袄”第七十九回:“(戴氏)四钱八分银买了一疋平机白布,做了一件主腰,一件背搭。”主腰指贴身的衣服,主要用于女性,可以是单层,也可以是夹层的。又第九回:“(计氏)下面穿了新做的银红绵裤,两腰白绣统裙,着肉穿了一件月白绫机主腰。”本书中“主腰”和“肚兜”不同,书中“兜肚”也多次出现,并且全是男性在使用。如第七十回:“那看门人把钱装在

兜肚里,蹭到厅前。”吕叔湘根据明容与堂本《水浒传》的插图,考证出形制,横裹於胸肚的小衣,用纽扣扣住胸襟,穿在衫子之内。依照他的解释可以认为“主腰”是类似于“抹胸”,但“主腰”除了可以束胸,还有御寒功用。

明代初期,文武官员的衣带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明史·舆服志》卷三,洪武二十三年定:“腰带,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乌角。”本书第七六回:“童寄姐穿着大红纁丝麒麟通袖袍儿,素光银带,盖着文王百子锦袱,四人大轿,十二名鼓手,迎娶到寓。”又如第八十五回中素姐出门时系的也是一条“素板银带”,但一般带都有纹饰,有的甚至相当复杂,如江苏南京市邓府山明佟卜年妻陈氏墓出土的镀金银腰带,带板有19块,表面模印“四友”图案,构图清晰生动^⑧。明代尤其重视玉带,各地出土的玉带板也很丰富。山东、江苏、江西等都集中出土大量的玉带。明代的玉带初期严格,晚期较宽松。“蟒袍玉带”是当时显赫的装束,玉带具成为当时的宝货。它的质地也同样是多样的,有金镶玉带、玲珑玉带等类,玉带还有宽窄的区别。明代称玉带之阔者为“四指”,“四指”合6厘米许。男带一般较宽,本书第五回苏刘二人:“穿着大红纁丝麒麟补服,雪白蛮阔的雕花玉带,拖着牌纁印绶,摇摆进去了。”江苏苏州明徐蕃夫妇墓出土的腰带,男带宽就是6厘米,女带宽则为5厘米^⑨。而女带相对来说较窄,在《天水冰山录》中就出现“窄女带”“极窄女带”。本书第七八回:“二位太太俱穿着天蓝实地纱通袖官袍,雪白的雕花玉带”,也是女用的玉带样式。

五、此书中出现的鞋袜

明代男子足上所穿形制仍以履、靴、鞋为主。靴非一般百姓能穿,百姓多穿以自制材料制的鞋。如蒲鞋、布鞋、棉鞋等。本书第三十九回中薛教授收拾箱子时就放有“一双蒲鞋”。云头鞋多为男子穿着,有的



图一三 明张懋墓出土云头鞋^⑩。但有女的穿,第

七一回中童奶奶:“月白秋罗裙子,沙蓝潞绸羊皮金云头鞋儿”,讲究的主子,上床歇宿时,有专门的睡鞋,本书第五十回中孙兰姬送给狄希陈的包裹中就放了一双“红绸眠鞋”。

本书中弓鞋有“跷脚弓鞋”、“沙蓝绸扣的满面花弓似的鞋”、“玄色段扣雪花白绫高底弓鞋”等,第五十九回:“龙氏穿着油绿纁纱衫,月白湖罗裙,纱白花膝裤,沙蓝绸扣的满面花弯弓似的鞋。”就是弓鞋。弓鞋也是明代妇女日常所穿鞋之一。明代女子沿袭了宋代缠足之俗,弓鞋之弓都与缠足有关。说法有二:古称一虎口为一弓,女子缠足之鞋极小,故称。或说女子缠足穿鞋似弓样,亦称弓鞋。总之,弓鞋是指缠足小脚穿着的鞋。所著弓鞋有高底平底之分。明代老年的妇女,大多穿平底鞋。鞋面以布或缎制做,多绣花鸟图案,故亦称绣鞋。其形制,中部弓起,前底尖并向上翘,合于妇女裹折后的脚形。鞋长三寸余,亦称作三寸弓鞋。在北京定陵墓出土实物中,其中出土女鞋有19双,均为弓鞋。其样式分为三类,一类是尖足凤头鞋,其中平底有4双,高底有11双;一类是尖足云头鞋有2双,鞋面为红色织锦,鞋尖两侧缝缀有云头形饰,还有一类是凤头形鞋也有2双,分别穿于孝端和孝靖皇后脚上,鞋底长,后跟宽。两双鞋都附有缎带,结于脚腕上。

本书中高底鞋出现的次数最多,第八十回:“把寄姐的膝裤,高底鞋,裙子、着水弄的精湿。”又如,第八十五回:“下穿百蝶绣罗裙、花膝裤、高底鞋”。这是素姐为祭祖所作的自我装扮。高底鞋是于鞋底后部装有4至5厘米的长圆高底,从而使脚趾竖立,鞋样缩小。因此成为明代时兴的女鞋。如《金瓶梅词话》多次出现高底鞋,可见明代当时高底鞋极其普遍(图一四),大致看出这种鞋的样子。



图一四

本书中提到的皂靴有六次,另外还有“粉底皂靴”、“水耳皂靴”、“木耳皂靴”三类不同的皂靴。第六十三回:“孟赵吾道自己是个指挥,又道是供明无罪之人,戴着罗帽,穿了屯绢衬衣,着了皂靴。”明代的“粉底皂靴”是白底黑面的靴子。皂靴本皮制,唐代始用麻布制做,后来多用缎制做。它一般是黑色短靴,本为乘马用,后演变为朝服。明代徐蕃夫妇墓发现夫妇俩都着朝靴,女子的朝靴小而头尖。黑缎为

面,白布底^⑩。

明代女袜长幅与男袜相等,或镶彩,或绣画,或纯素,甚至有用金珠翡翠作装饰的。袜子质料以绫、罗、绒为主。本书里提到袜类有:绫袜、绒袜、毡袜等,其上饰物虽各有不同,制式却大体相同。崇祯十年以后,袜的样式流行短小,仅施于腔上,下及于鞋。定陵出土袜14双,用绫、罗制成,有单袜、夹袜。大致与本书的袜类相似。膝下另用绵幅裹绑,属于绑腿一类。上端到膝盖,下端到脚踝,用绳缚于膝部,明代称作“膝裤”。此书中膝裤有蒙纱膝裤、白绫挑绣膝裤、白洒线秋罗膝裤、绒膝裤花膝裤等。本书第六十八回:“(素姐)白秋罗素裙,白洒线秋罗膝裤”,第九十三回:“拿了晁夫人自己的一件青绸棉袄,一件褐子夹袄,一条蓝绫裙,一双本色绒膝裤”,膝裤亦称胫衣,又叫膝袜。《清稗类钞·服饰》:“膝裤,古时男子所用……后则妇女用之,在胫足之间,覆于鞋面。”定陵出土膝裤20双,皆在万历的棺内,呈长方袋形状,绢面、缙丝面,有里子。上口略小,下口略大,无底。上部留衩口,衩口两侧各钉一带,长约22厘米。

本文撰写过程中,承蒙陆锡兴先生的巨大启发,在论文的思路、材料收集、结构安排各个方面都得到悉心指导,在此谨致感谢。

注释:

(明)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王肃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香港太平书局,1998年。

孙机:《明代束发冠、髻髻与头面》,《文物》2001年第7期;《明代金银首饰图说》,《收藏家》2008年第8期;《明代金银首饰图说(续一)》,《收藏家》2008年第12期。

扬之水:《明代头面》,《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4期;《明代的耳环和耳坠》,《收藏家》2003年第6期;《钗头凤》,《收藏家》,2003年第8期;《明代女子的几种簪钗》,《紫禁城》2007年第8期。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高春明:《中国服饰名物考》,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

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文物出版社,1990年。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尘封瑰宝》,江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

南京市博物馆:《明中山王徐达家族墓》,《文物》1993年第2期;《江苏南京市明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墓》,《考古》1999年第10期;《江苏南京市南郊两座大型明墓的清理》,《考古》1999年第10期等。

^⑫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钟祥市博物馆:《梁庄王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⑬、^⑭ 南京市博物馆:《明朝冠服首饰》,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⑮、^⑯ 上海博物馆:《上海浦东明陆氏墓记述》,《考古》1985年第6期。

^⑰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南城明墓益庄王墓出土文物》,《文物》1959年第1期。

^⑱、^⑲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明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墓》,《考古》1999年第10期。

^⑳、^㉑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市博物馆:《明徐达五世孙徐辅墓》,《文物》1982年第2期。

^㉒ 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明华复诚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78年2期。

^㉓、^㉔ 唐汉章、翁雪花:《江阴长泾、青阳出土的明代金银饰》,《文物》2001年第5期。

^㉕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3期。

^㉖ 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第193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㉗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第321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㉘、^㉙ 四川省博物馆、剑阁县文化馆:《明兵部尚书赵炳然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2期。

^㉚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㉛ 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第218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㉜ 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第223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㉝ 四川省文管会:《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文物》1989年第7期。

^㉞、^㉟ 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局:《江苏南京市邓府山明佟卜年妻陈氏墓》,《考古》1999年第10期。

(下转第79页)

注释: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局:《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

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最早著录于吴大澂《愬斋集古录》,见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最早著录于《宣和博古图》,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蒋明明:《浙江绍兴市发现一件春秋铭文铜甬钟》,《考古》2006年第8期。

见《鸿山越墓发掘报告》,以下所有鸿山乐器同此,不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浙江海盐出土原始瓷乐器》,《文物》1985年第8期。

余杭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余杭崇贤战国墓》,《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年第1期。

①⑦、①⑨ 浙江省博物馆:《越魂》,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①① 沙孟海:《配儿钩鐙考释》,《考古》1983年第4期。

①② 倪振逵:《淹城出土的铜器》,《文物》1959年第4期。

①③ 绍兴市文管会:《绍兴发现两件钩鐙》,《考古》1983年第4期。

①④、①⑧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①⑤ 蒋玄伯、秦明之:《中国瓷器的发明》,艺苑真赏社,1956年。

①⑥ 萧山博物馆:《萧山古陶瓷》,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②① 沈作霖:《绍兴出土的春秋战国文物》,《考古》1979年第5期。

②①、②⑥ 绍兴市文物管理局:《绍兴文物精华·下卷》,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②② 萧山市博物馆、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萧山市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萧山文物》,西泠印社,1999年。

②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彭东、东安土墩墓与石室土墩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②④ 李国梁主编:《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⑤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②⑦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②⑧ 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年第12期。

②⑨ 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3-4合期。

③① 蔡丰明:《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学林出版社,2006年。

③① 《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六·兽部八·马四。

③②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③③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上接第104页)

③④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区李文贵墓》,《文物》2008年第9期。

③⑤ 南京市博物馆:《明朝首饰冠服》,第167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③⑦ 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第209页,紫禁

城出版社,2004年。

③⑨、④① 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市明代徐蕃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9期。

④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懋夫妇合葬墓》,图版24,科学出版社,2007年。



本期导读

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历史上,明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它恢复了受到蒙元破坏的中原舆服制度,恢复了古来一贯的衣冠服饰传统,继承中有所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辉煌时期。但是后来明朝为满清所取代,改易服饰,流传数千年的华服从此中断。距今不过三百来年,一个不是很长的历史时期,却显得非常陌生。而东顾韩国,在引进明代制度之后,基本未被侵扰,代代相传。乍见之间,犹如时光倒转,大明朝的盛景重现。明代是通向中原古代服饰的桥梁,我们了解了明代,就又可以上溯汉唐了。

明代之重要不仅在于打开中原服饰殿堂的钥匙,能执其牛耳,明代更有有吸引力的是良好的客观条件。首先,明代墓葬的保存情况良好,这既得益于特殊的墓葬技术,封存良好,也得益于历时短暂,盗掘危害有限。上世纪下半叶以来,明代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掘整理了大量的重要墓葬。万历帝定陵是目前唯一完整发掘皇帝陵寝。各地的藩王墓,如江西南城益端王、益庄王、益宣王、益定王,山东邹城明鲁荒王墓,湖北钟祥梁庄王墓以及江西南昌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公侯贵族墓集中于沪宁一带,南京靳国公康茂才墓、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墓,中山王徐达家族墓以及周边郊区明墓,江苏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王锡爵墓,无锡华师伊夫妇墓,泰州市徐蕃夫妇墓,江阴长泾、青阳明墓,上海浦东陆深墓、打浦桥明墓等。这些墓葬出土了众多纺织物和金银器宝石为主的珍贵文物。发掘报告越来越详细地报告科学发掘、整理情况,透露了文物的全面信息,同时发表了初步研究成果,其中以大型报告《定陵》、《梁庄王墓》尤为突出。而且,明代的历史文献数量庞大,《明史》、《明会典》等正统的史书外,还存有大量的笔记等,特别是世情小说,记录了丰富的信息。此外版画的兴起,明代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的精美插图提供了各种可贵的具体的图像资料。近年来,以孙机先生为代表的研究者,锲而不舍地努力,在明代服饰研究领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女子的头面、服装、霞帔等杂件,男子的头巾、束发冠等,作出了详尽而可信的考证。

如所有的古代文化研究一样,由于历史的断裂造成的认识上的空白,明代的服饰依然存在许多未知问题,要满意地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明代服饰研究依然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从出土实物出发,依照服饰的品类,整理发展条理。一是可以从某些明代的文献出发,根据文献所记载的器物作系列的研究。当然不同角度并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不过是侧重而已,现实的科学研究中实物和文献是密切不可分割的。古代器物的信息是多方面的,它保存在实物中,也保存在抽象的文献中。实物固然有形,最直观,最具体,是无可争议的客观存在。但是实物是沉默的,认识它却要考验我们的智慧。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难以摆脱主观的经验意识。器物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现象,某器物并不是只有一件,我们发掘到的部分,不一定是具有代表性,或者全面性。这两个方面都会把我们引入误区。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当时人的观点来认识这些实物。最重要的是把实物与文献贯通,这要考验研究者的学识。

本期发表的《明代巾、簪之琐论》,从微观着手,对网巾等六项器物,从梳理文献到调查出土实物,探究起源、形态、使用方法等,希望对这些头上细小物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文章指出,网巾并不是明代的创造,而是对唐宋以来网子的改进,重要性在于它的使用在明代得到了制度上的肯定。头巾环子和网巾圈子虽然相近,不过大小、使用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不能视为一物。至于古折簪子、古折戒子和万字巾是常见之物,以致以前很少有人花功夫去研究。

《醒世姻缘传》是一本写实小说,它描写了社会中下层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是明代晚期世俗社会的一面镜子。《从〈醒世姻缘传〉看明代晚期服饰》一文在整理所有服饰名词的基础上,结合已经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让明末市民的服饰有一个全景式的展示。现在对于明代服饰的研究虽然好于其他朝代的研究,但是涉及的面毕竟有限,已有的结论,也未必是完全正确,况且尚有大片未知空间,因此该文的内容有所不足,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从一本小说去探究古代器物形制不失为一条新的途径,如果做得扎扎实实,也许是值得徜徉的光明大道。

(陆锡兴)